

「男人是這樣煉成的」： 各生命階段直男同性友誼中的 男子氣概建構初探*

李佩雯**

摘要

本研究採取關係互動與複數型男子氣概理論研究視角，試圖探索本土異性戀男性友誼與男子氣概之間如何互相形構。本研究針對不同生命階段共 17 位青壯世代大學教育程度以上、中產階級男性進行深度訪談。研究結果顯示，受訪者隨著各生命階段所累積的關係碰撞與性別不平等覺察，其男子氣概建構顯現出從傳統霸權式朝向包容、性別平等轉型的軌跡。中壯年受訪者展現出較多反思霸權男子氣概的能動性，然而異男同性間對彼此的友愛與情感表達仍是禁忌。

關鍵詞： 包容型男子氣概、同性友誼、同性社交、男性研究、複數型男子氣概

* 由衷感謝所有與我分享生命成長故事的受訪者們，也特別謝謝研究助理吳萱的悉心協助。本研究由 105 學年度世新大學學術研究專案計畫 P10603〈透視直男的約會：非戀愛關係男性友誼互動初探型研究〉補助。

** 李佩雯為世新大學口語傳播暨社群媒體學系副教授，E-mail: pwlee@mail.shu.edu.tw。
投稿日期：2019/11/04；通過日期：2020/8/31

壹、直男的約會：研究發想與問題意識

《紐約時報》的一篇 2005 年舊文〈直男們，願意來一場男男約會嗎？〉¹ 定義「直男約會」(man date) 為異性戀男子間進行與生意或體育活動無關的社交行為。比方說，兩位男性一起出去玩，逛博物館、到有情調的餐廳用餐、在公園裡散步、去看愛情電影，這些都是直男約會。但是，一邊吃飯一邊看電視、到公園慢跑、一起去看車展，這些就不算。這篇文章挑明了直男約會如何讓異性戀男性們感到不自在，指稱直男約會的內容其實就是目前存在於一般男性彼此往來互動之中的性別禁忌。

該文的討論，喚起筆者對異性戀男性² 同性友誼及其關係互動形式的思考。筆者在網路上尋獲的幾篇有關男性友誼的研究型報導³ 通通指向一個結論：男性與女性之間經營友誼的形式有所差異。男性與男性之間的交往，幾乎都是一起並肩 (shoulder to shoulder) 從事活動或偏向任務型導向 (activity or task oriented)，舉凡運動、喝酒、打電玩遊戲，亦或是聚會時動不動就吆喝一群人一起玩；男性相對比較少像女性一般，願意兩人單獨約出來面對面純粹聊心事。Wood & Inman (1993) 早期整理了六〇至八〇年代將近四十篇同性友誼相關研究後，也得出類似的結論：女性普遍將親密同性友誼中的私人討論 (personal talk) 列為優先順位，但是男性友誼則相對重視一起從事活動；女性較能自然表達情緒，男性則較少自我揭露。相較於女性，男性的友誼似乎較少倚賴明顯直接的言語表達，或是以自我揭露的方式來維繫其親密性。

上述探討歐美異性戀男性、女性同性之間友誼互動的研究結果，很容易引導讀者落入性別二元論的窠臼。美國溝通學者 Wood (2015) 曾以建構論與社會學習理論說明，兩性友誼互動型態的差異與男女從小的遊戲型態，與被社會化的人際互動有關。然而這樣的觀點仍舊過度強調男女性別角色二分，暗示個體對於社會常規的被動式順服，反而忽略了個體於性別學習過程中主動參與及挑戰既有傳統規範的能動性 (Connell, 2002)。因此筆者想提問的是：當代臺灣異性戀男性間的友誼互動模式，真的有如歐美研究所言，如此性別二分與刻板嗎？直男間的情感交流與談心還會被視為是同性間的交往禁忌嗎？

對直男而言，除了與異性間的性與愛情等親密關係以外，同性之間的交陪亦是性別認同與男子氣概建構的重要場域（王大維與郭麗安，2012）。男子氣概並非天生本質的存在，而是透過人與人之間的互動與社會實踐中形成（Connell, 2001）。換言之，男人同性社交的過程同樣也是其權力展現、性別價值觀與意識型態踐履的重要歷程，亦即其男子氣概建構的過程。綜合上述，筆者好奇的是，當代本土異男同性友誼關係的互動型態為何？與過往的研究結果相較是否可見跨越傳統性別二分的實踐？這些異男友誼互動過程又同時形構出何種樣貌的當代本土男子氣概？

貳、男性友誼與男子氣概之文獻回顧

本研究的文章探討由三個面向著手。首先，筆者從過往的溝通文獻中探究男人同性間「做」（doing）的友誼及其中所顯現的「避免女性特質」與「恐同」等性別規範（包含西方文獻中所指稱之 homophobia, transphobia, and sissyphobia 等）。接著，本研究進一步討論男性情誼互動過程中所造就的男子氣概及西方的多元理論觀點。最後，筆者將文獻回顧焦點轉回本土男子氣概的研究，包含文武傳統典型與現代新型貌的闡述，以協助理解本研究中本土男性同性交往與男子氣概形塑之變化歷程。

一、男人同性間「做」的友誼

國內外的研究揭示，男性與同性之間的情誼偏向「做」的友誼。趙梅如與王世億（2013）針對 463 位臺灣北中南部一到四年級男女大學生進行的問卷調查結果指出，在同性友誼中，男性顯現出實務導向，對於與友人共同從事具體活動較為感興趣。西方的友誼文獻亦有相似的指陳。Wood（2015, pp. 191-193）檢視男性同性友誼的內涵，結果發現男性同性友誼至少可被歸納出五種特色。第一，男性通常在共享的活動中建立友誼，其與友人的親密性往往是透過一起「做」某些事中建立而來（closeness in the doing）。第二，男性間的友誼聚焦於工具性（instrumental focus），男性習慣藉由「幫忙」來表露自己對朋友的關懷。第三，男性傾向以「間接表達」（indirect talk）的方式來面對內心的困擾，比方說，以開玩笑的口吻（joke talk）或幽默

的方式將一個嚴肅的議題輕輕帶過，或是以輕鬆的玩笑引導友人遠離憂傷，或去做其他比較開心的事。第四，男性友誼的親密是「隱晦的親密」（*covert intimacy*），男性經常會以嘲笑彼此、進行好玩的體育競賽項目來表達感情。最後，男性傾向將「朋友類型化」（*defined spheres of interaction*），亦即，從事不同活動時可以找不同類型的朋友，而女性間的情誼則比較常出現全面性地涉入友人生活的情形。

不少研究者針對男性友誼互動中較少進行自我揭露與情感交流的現象提出解釋。舉例而言，李美枝與鍾秋玉（1996）認為華人文化中男性通常被期待具備獨立自主、果斷、有能力解決問題等工具性特質，而女性則被認定應該富有依賴、順從、情感導向等感性特質。因此，李美枝與鍾秋玉強調，這樣的社會化性別角色差異，導致兩性在同性友誼互動上亦呈現不同的相處方式。

除了性別角色期待上的差異，Maccoby（1990）則認為男性為了維護自身的優越性，傾向約束自己的情感表達，以免在言談間顯現出自己的脆弱。Chu（2005）、Stearns（1990）、以及 Kindlon & Thompson（1999）也都提出了「陽剛男性規範」（*masculine norms*）的概念，亦即，男性必須表現出粗曠、不拘小節、異性戀中心、對他人感受不甚敏感的樣貌，因此也漸漸造成男性在親密關係中無法體察或表達自我的感受。為了證明這樣的陽剛特質，男性必須從避免像個女人開始，爾後漸漸失去與人建立親密人際關係的能力，甚至以為自己並不需要這樣的親密關係。此外，在團體中，男性在乎的是能夠被認同、需要有人罩、有人可以一起集結出氣。在這樣的氛圍底下，男性學會了個人的感受並不是重點，重要的是群體成員能否將砲口一致向外，久而久之男性為了怕被團體排擠，遂逐漸削弱其自身敏感性與情感表達的能力。

如前文所述，男性的親密是透過活動或其他方式來表現，男性通常透過邀請朋友參加群體活動來表達他們之間的關係良好。因為許多男性從小被教育不應該顯現脆弱，所以他們學習隱藏悲傷與恐懼，很少透過口頭表達內心的懼怕或情感。他們也害怕這種坦承內心情緒與感受的行為會被誤解為缺乏陽剛男子氣概，或趨近於同性戀，因此男性間的親密關係是一種非常隱晦的親密，這種親密通常表現在活動、體育項目和競賽中，那是一種與好友一起在活動中享受樂趣的親密（Swain, 2000）。

舉例而言，臺灣的青少年男性，通常是高中生，流行一種非常特殊的親密建構方式—阿魯巴。⁴ 郭怡伶（2005）的碩士論文針對臺灣高中生的阿魯巴行為進行探究。她發現，阿魯巴這樣的活動反映出的是青少年男性無法示弱、不能表露自身情感的性別文化。由於青少年男性害怕表達情感會被連結到同性戀、顯得不夠男人，因此郭怡伶（2005，頁 100）在其研究中歸結：

男性間的友情只能互相交流動作，而非情感上依靠的交流，就算要交流心裡話，也要有憑藉的標的物，例如菸及酒。身體的距離遙遠，要藉著運動或像阿魯巴這樣的動作才能互相接觸，不被擔心是過度地親密。

畢恆達、黃海濤、洪文龍與潘柏翰（2017，頁 38）近期的研究結果也顯示，阿魯巴是一種男性間企圖表達喜愛與善意的親密接觸。這種集體歡樂式的校園遊戲，可以讓升學壓力下的苦悶青少年偷渡身體接觸，建立同儕認可與團體歸屬的情感。因為男性在成長階段中，不斷被灌輸異性戀男子氣概的形象，像女生一般表達感情的能力又因為避免女性化的想法，被過度壓抑，最終只能由其他男性化的行為活動所取代（Migliaccio, 2009）。男性間的友好觸碰，例如：擁抱或牽手容易被懷疑是同性戀，久而久之，臺灣青少年只好放棄情感交流的機會，轉而發展出這種看似殘酷，實則充滿體力發洩與建立革命情感的陽剛男子氣概互動型態。

的確，除了年幼時男孩之間的交友關係，成人之後的男性親密友誼很容易與同性戀產生連結，也因此造成男性親密互動之不可能。甚至伴隨而來的結果是，所有親密之情只能轉嫁到男女關係之上，這無疑對異性戀親密關係形成莫大的負擔。除此之外，恐懼同性戀為男性友誼所帶來的另一個災難是，男性之間的親密關係變得毫無腳本可循，放眼望去，在日常生活中也無實例可參考。如學者朱偉誠（2015，頁 56）所言，「這樣的男性親密友誼是沒有既定符碼可供表達的。」就算某些男性心中真的想與其他同性友人發展非典型的親密友誼，也無法確定這樣的關係究竟該如何發展。

事實上，西方研究指出，青少年男性渴望擁有緊密的人際關係與親密的友誼，他們也希望被真正的理解與接納。Chu（2005）的研究

發現男性青少年在同儕團體中發展親密友誼的矛盾：一方面男孩們希望在同性小團體中受到緊密關係的保護與支持，以抵抗外界壓力，另一方面，男孩們又需要面對違背團體中男性規範、期待的懲罰。結果，男孩們學會不輕易揭露自己脆弱之處，以免淪為他人把柄。但，時間久了，男孩們卻逐漸失去建立親密連結的能力。同樣地，Way（2013）在其長期（3-5年）、跨種族（非裔、拉丁裔、亞裔、歐洲裔）男性高中生跨越至大學生的研究中發掘，對男性受訪者來說，能夠與好朋友分享祕密，可以有什麼說什麼，是非常重要的友誼核心，有助其心理健康發展。研究參與者透露，雖然他們心中仍然渴望能夠擁有可分享心事的同性好友，但是他們的親密同性友人卻隨著年紀增長逐漸遠去。彷彿越長大，男性好友就逐漸被形塑成只能一起玩、一起做活動、一起競爭（吹噓）的夥伴，而不是可以分享深層內心的對象。這種情況尤其容易出現在白人以外的族群，這些族群的男孩們維持可以說心事的同性朋友的比率更低。

綜上所言，國內外早期的研究指出，男性渴望透過言語情感交流來發展親密友誼的可能性，因為廣義的陽剛男子氣概規範而隨著年紀增長逐漸減少。不過，這樣的研究發現似乎傾向本質論的觀點，忽略了性別關係乃是透過人際互動學習建構而來，男性個體亦存在著翻轉、挑戰傳統性別角色期待與規範的能動性（楊幸真，2012）。筆者質疑，本土男子氣概在男性友誼中的體現與建構真的如此單一嗎？難道僅有一種「陽剛、不能示弱」的男子氣概主宰了當代多數男性在人際關係中的實踐？

二、再探當代男子氣概的多元理論觀點

男子氣概（masculinities）在中文語境中出現幾種不同譯法，包含：男性氣質、男子性、陽剛之氣、男性特質等。筆者認為「氣質」與「特質」的譯法容易使人連結到「個性」，雖然男子氣概的確涉及個體的性別氣質展演，但也同時牽連到權力關係與其他互動行為實踐（Connell, 2002）。「陽剛」之氣的譯法則容易與本研究欲論述的「多元」男子氣概特徵產生混淆。因此，筆者於本文中選擇以大眾熟悉的（不單指陽剛）「男子氣概」一詞來指稱影響男性於特定文化社會中性別符號實踐的性別價值觀與意識型態。

著名的男子氣概理論學者 Connell（1995）認為男子氣概為男性

自出生後依循性別關係不斷學習，與來回協商權力與社會制度的動態「做性別」(doing gender)過程與結果。其意涵與身為男人當做當想之事 (manhood)、男性認同 (male identity)、陽剛之氣 (manliness)、男性角色 (men's roles)、性別認同 (gender identity) 皆有所重疊 (黃淑玲與白爾雅, 2018, 頁 275) 黃淑玲 (2006) 的研究發現, 臺灣男性大學生定義的男子氣概多與外表形象相關: 體型、個性、動作具有陽剛特質, 必須堅強勇敢, 不可像女孩子。但 40 歲以上的受訪者所認知的男子氣概則偏向社會期待與角色: 當個稱職的兒子丈夫與父親、事業有成、照顧家庭與鄰里。簡言之, 男子氣概的概念形塑與實踐受性別體制、社會結構, 與文化傳統所影響, 它既是一種文化意識型態更是男性行為與思想的規範準則。

當代西方男性研究幾乎多把男子氣概視為多元、複數、不斷變動的概念。性角色理論 (sex role theory) 於八〇年代前一直是男子氣概研究中的主流, 本質化地主張生為男性或女性就意味著必須扮演社會對此性別的一整套期待 (Brannon, 1976)。直到 Kessler 等人 (1982) 提出了「霸權式男子氣概」(hegemonic masculinity) 的概念, 學者們才開始重新思考一般人認知的陽剛、具野心的男子氣概, 其實僅來自歐美、白種人、中年、中產階級異性戀的男性觀察。於是, 西方文獻轉而開始關注男子氣概的複數與多元性, 主張霸權式男子氣概並非自然產生, 它是情境化的、可變的, 它不存在於社會真空中, 而是動態的, 在性別關係間彼此互相影響下建構而成 (王大維與郭麗安, 2012; Connell, 2003)。

Bird (1996) 最早開始探討「同性社交」(homosociality) 的概念, 強調異性戀男性之間的同性交往透過情感疏離 (emotional detachment)、同性之間的競爭 (competitiveness)、與物化女性 (sexual objectification of women) 等行為實踐維持霸權式男子氣概掌控性別權力的規範 (參見 Arxer, 2011)。而 Connell (2003) 隨後亦發展出複數型的男子氣概理論, 闡明性別秩序建構可從三種關係模式來分析: 權力關係 (女性的從屬與男性的統治)、經濟關係 (性別勞動分工)、情感關係 (個人私密生活、婚姻)。Connell (2005) 指出男子氣概乃是男性所持有的權力與其所處社會位置間的互動關係, 可分成 (1) 霸權式 (hegemony) 男子氣概: 其合理化男性支配、主宰關係、參與競爭, 挑戰權威等特徵; 其之所以以「霸權」稱之, 乃因

其所強調的男性特質最具有主導優勢，最為人們所同意及順從，可見度亦最高；（2）從屬式（subordination）男子氣概：一詞所指涉的主要是男同性戀的男子氣概，以及不符合異性戀男子氣概規範的陰柔異性戀男性，於日常互動中所展現出來的性別階序或性別不對等關係；（3）共謀式（complicity）男子氣概：雖不直接進行壓迫行為，但內心卻認同並順從父權體制下權力不對等的現實；（4）邊緣化（marginalization）男子氣概：乃是性別與其他社會結構，如階級和種族之間互相交織作用後所發展出來的位階關係，例如：社會上無權勢的男性，因為不容易被看見，遂採取不為社會所容之非理性男子氣概行為，舉凡飆車、以暴制暴、混幫派等（許華孚，2008）。Connell 認為男子氣概建構的過程並非透過社會化的常規學習，而是多種途徑，同時受到階級、種族等互相交織形塑的結果。對於男子氣概的分類，Connell 也並非強調單一、片面、固定的形式，其更看重關係、多元、及權力之間相互交纏，個人可能同時存在多樣且相互矛盾的男子氣概（Connell, 1995, 2001, 2005）。

近期的英美文獻進一步指陳，當代男性同性交往已逐步挑戰既有的性別權力關係，重新建構出異男之間轉變中的親密情誼（Flood, 2008; Hammarén & Johansson, 2014; Haywood, Johansson, Hammarén, Herz, & Ottemo, 2017）。如 Anderson（2009）所提出的「包容型男子氣概」（Inclusive Masculinity Theory, IMT），可見於多數年輕、中產階級、受教育的男性白人團體。採用 IMT 的研究特別強調年輕男性不再像上個世代男性一般害怕被指認為同性戀（the decrease of homophobia），反而選擇遠離傳統霸權男子氣概、恐同、厭女等信條，比較願意在男性情誼中開放地表達感情、愛，甚至肢體上的接觸，軟化我們過去所想像的陽剛式性別符碼。IMT 說明了不同文化階級與世代男性之間的差異，而這個差異凸顯了男性之間的交往不見得必須建構在「同性群體內階序」（hierarchical homosociality）的基礎上，因此弱化了明顯的恐同態度、行為與男子氣概的規束，甚至間接推動了西方同性法律保障（更多討論參見 Anderson & McCormack, 2015, 2018）。舉例而言，Rumens（2018）研究職場上的異男與男同志之間的友誼後發現，年輕世代的男性表示直男與男同志之間經常透過情緒與肢體上的支持來展現情誼，並相互學習彼此因為性傾向差異所經歷的生命經驗。而該研究中的老年男同志也指出，現今在職場上

不難遇到具包容性男子氣概的年輕異性戀男性，此現象與他們年輕時的處境迥異。

與 IMT 近似的概念研究還有「兄弟情」或「同性情誼」（“bromance”，Robinson, Anderson, & White, 2018; Robinson, White, & Anderson, 2017），其同樣主張異性戀男性之間平等相處之道（horizontal homosociality），強調 1980s、1990s 後出生的年輕男性比較不害怕被看成同志或女性化，即便恐同的情況並非完全消失，但他們對同志明顯表達反感、恐懼的言論大大減少。兄弟情的男性交往特質強調共享的興趣、情感表達與肢體親密的維繫，擁抱和親吻亦公開而不避諱。此等朋友親密宛如男女朋友一樣，但卻又不是男女朋友，更像自己的親兄弟，可以對同性好友傾吐任何秘密與心事，彼此之間毫無界線（lack of boundaries），亦無不可碰觸的禁區（nothing being off limits）。與異性戀愛情關係相較，兄弟情不必擔心過度揭露會被評斷或引起爭執（Robinson et al., 2017）。

但，男性間此等的交往進展也可能有壞處，如同 Arxer（2011）的研究發現，男性之間不再恐同，但是卻有可能聯合起來成為「我群」（us），相對於他們的女性伴侶「她群」（them），而形成一種依然強化二元對立的男女關係。易言之，雖然歐美年輕男性同性交往傾向更為情感開放，但卻不必然代表他們相處時所談論的話題完全脫離了父權與霸權男子氣概的意義再製。de Boise（2015）同樣對 IMT 進行批判，並加入對 Connell（2005）共謀與邊緣式男子氣概（complicit and marginalized masculinities）的思考。de Boise 最終認為 IMT 對男性研究的貢獻不多：嚴格說來，包容型男子氣概（inclusive masculinity）與共謀式男子氣概（complicit masculinity）雷同，這樣的男性雖然表面上不再疾聲攻擊同志，但實質上卻仍坐享父權紅利（patriarchal dividend）。

這類研究觀察，讓筆者不得不重新省視 Demetriou（2001）曾經提出的「霸權男子氣概集合」（hegemonic masculine bloc），亦即再製傳統父權機制的男子氣概模式可能透過一種非常幽微地不斷協商（negotiation）、轉譯（translation）、挪用（appropriation）、雜揉（hybridization）、與重構（reconfiguration）的辯證互動過程，以達到表面上看起來像是反霸權男子氣概的進步表徵作為，但實質上卻只是另一種父權再製的表象工具。換句話說，正當我們從西方研究中看

見年輕男性也能如此柔軟地去愛彼此，而對趨近於性別平等的男子氣概建構產生一線生機時，我們亦不可小覷「雜揉式男子氣概」（“hybrid masculinity” or “hybridization”，Bridges, 2014; Bridges & Pascoe, 2014）的近期研究成果。同樣是針對年輕白人異性戀男性，學者們發現雜揉式男子氣概的表現特別彰顯語言表達上對於權力與不平等的疏離，但實質上對於不平等的挑戰卻相當少見。這群男性善於在口頭上將自身置外於其現存的優越與不平等系統，刻意凸顯自我與其他邊緣、弱勢男性共同爭取權利和肯認的認同，而實際上透過符號語言（symbolic systems）來隱蔽、強化與其他種族、性別、性群體之間的社會界線，儼然形成一種新型態的性別不平等。

這群優勢男性的同性交往透過與上一世代男性截然不同的表現形式（“more style than substance” Messner, 1993, p. 724），可能形成男女之間「我們與她者」的二元對立，而在男性親密的情感分享當中不自覺地透過（性）話題交流來物化女性、壓迫其他弱勢男性，或是重申父權紅利、區隔男性優越（good men vs. bad men，例如凸顯自己並非傳統的直男，自己是不無聊的、具備同志特色的優質異男，Bridges, 2014），藉此再製權力並鞏固其霸權位置。至此可知，支持 IMT 的此類研究以一種「正面、好消息」的論述方式，企圖在西方學術圈獲得讀者的肯定，但是該理論其實是從一個後女性主義的角度，弱化男子氣概研究中性別政治的重要性，試圖從研究結果中宣稱文化與社會已經改變，並混淆大眾性別平等已經到來（O’Neill, 2015）。

三、本土男子氣概的移轉：文武傳統典型與現代新型貌

華人社會的男子氣概乃是以「文武概念」作為基本框架。傳統中國社會存在兩種併行的理想型男子氣概：文人與武人，其分別以孔子與關公作為典範，並將女性排除在文武人士之外（Louie, 2002）。文武男子氣概源於儒家思想，「文」指的是受過良好教育、德行出眾且文人化之君子；「武」則是指體魄強健、果敢無畏之勇士；文武兼備乃是中國傳統菁英的重要特質。但是儒家傳統下的文武精神也經常產生對立，科舉制度出現後更有「重文輕武」的現象。以臺灣社會目前高度重視學歷而輕視努力工作的趨勢來看，應是受傳統重文輕武觀念的影響。雖然臺灣男性亦崇拜流行文本中驍勇善戰的英雄人物，肌肉男也越來越受大眾歡迎，但現代武將（軍、警、運動員）卻仍稱不上

是社會廣泛定義的菁英人才。臺灣男性從小到大的學業競爭，在在指出現代文人（工程師、律師與醫師），才是本土男子氣概的主流象徵與王道（黃淑玲、白爾雅，2018，頁 279-280）。

不過 90 年代以降，受全球消費主義、東亞流行文化等綜合影響，臺灣男性逐漸轉而開始重視身體形象，繼而出現了有別於傳統君子與武將的其他男子氣概特質的男性類型，包括（1）都會美型男（metrosexual men）：注重身材打扮，懂得透過消費商品來展現男人味，近似於傳統文人，具事業與學業上的競爭力，但是更富有時尚品味（袁支翔、蕭蘋，2011）；（2）少年花美男：受美少年漫畫與偶像明星的感染，具備陰柔、秀氣可愛，愛漂亮等特質，關注時尚化妝，甚至會稱自己很「娘」（此處的「娘」是多義的）（楊幸真，2012）。事實上，「柔性化男子氣概」（Pan-East Asian soft masculinity）已成為東亞近來的趨勢，此般有如賈寶玉類型的俊美陰柔男明星，於臺灣及南韓流行文化中經常可見，與西方男明星崇尚的陽剛、勤上健身房形象的壯碩肌肉男形成強烈對比（黃淑玲、白爾雅，2018）。

另一方面，本土男性情誼的相關研究，發掘了不同成長階段男性所經歷的同性關係面向與男子氣概建構經驗。校園中，小學男生藉由體型、年級與力量等優勢進行性霸凌行為，取得同性間的支配與控制地位，以服膺霸權陽剛特質的論述與實踐（張榮顯與楊幸真，2010）。高中男生透過正式（學科成績與體育表現）與非正式文化（同儕互動）交織作用出其陽剛特質，同時並不拒斥陰柔化的男性身體與陰柔氣質（楊幸真，2012）。而男大生則開始學習在自我的兩個主體間游移與協商：一方面必須順從主流霸權式的男子氣概，另一方面又得在不同的情境時刻採取較平權、非主流的從屬型男子氣概論述（王大維與郭麗安，2012）。以軍隊來說，「學長學弟制」乃是促成軍中同性群體內階序的重要機制。舉凡建立我群關係下的敬菸酒、送飲料、交換性經驗故事、「女人化」武器，這些軍中同性緊密情誼發展出的互動形式，同時也強化了異性戀中心與恐同的霸權式男子氣概（高穎超，2006）。

離開校園進入社會之後，男性在工作與家庭場域中的男子氣概深受職場文化與性別角色期待所形構。例如，黃淑玲（2003）從喝花酒的「頭家型男子氣概」研究，理解喝花酒的文化將色情場所建構成一

個生產與消費男子氣概的資本競爭市場，不同階級的男性透過消費女性來比拼派頭與威風。何明修（2006）發現臺灣工會運動以一種共同的男性身分，對抗上司長期的威權主義統治，雖然試圖追回喪失的男性尊嚴，但這樣的「戰鬥性男子氣概」動員卻進一步鞏固了男女之間既有的性別不平等。而孫志硯（2008）的研究發現，攝影記者利用人際網絡轉化成社會資本，藉機排除異己與收編同類，欠缺陽剛競爭特質的男性攝影記者便容易失去新聞產業晉升的機會。論及家庭中的男性，涂懿文和唐文慧（2016）探究了移動、家庭關係與「鄉村型男子氣概」之間的交織與互動，結果發現鄉村成年男性離家遷移的行動決策關乎其是否符合傳統孝道，亦即其陽剛氣質是否受損，而這種不可長期離家的孝道實踐正是鑲嵌在臺灣社會文化脈絡裡特有的霸權式男子氣概論述之中。比較特別的是，林東龍與劉蕙雯（2016）的研究指出，目前臺灣已可見「照顧型男子氣概」（全力照顧、兼顧工作兩型）的受訪者，他們重新定義了男子氣概的標準，強調打破性別框架實際投入家庭照顧工作、履行父職，並以自身的家務及照顧能力自豪。

綜合上述，本土男性同性友誼與男子氣概的研究揭露，當代男性之男子氣概樣貌似有走出傳統文武概念框架與單一陽剛、霸權類型，並且朝向多元型態發展的趨勢。年輕男性（尤其是高中生與大學生）的同性關係互動，逐步可見西方文獻中所指陳之非傳統、包容型男子氣概在不同脈絡下彼此相互協商之現象，而離開校園後的男性仍多數受傳統性別角色意識形態所影響，其同性關係互動中明顯反映出霸權式男子氣概。筆者認為，目前本土的性別與傳播相關文獻，多半側重於媒體再現的理論取徑，相較於性別研究大多聚焦於觀察特定時期的男性同性情誼與男子氣概建構，本研究試圖以關係中的溝通互動與生命歷程的視角，來檢視當代異性戀男性於其各生命階段中的同性友誼互動樣貌，及該過程中顯現的男子氣概建構與動態轉變。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欲理解男性同性交往間的互動脈絡，需要藉由研究參與者豐富、深入的交友互動經驗與生命故事，方能探悉其友誼關係行為所蘊藏的意義與挑戰。因此適合透過質性研究方法中的一對一半結構式

深度訪談法來進行資料蒐集。本研究採取立意抽樣法（purposeful sampling），在研究團隊的臉書、PTT 上刊登研究參與者招募廣告，配合人際網絡中的滾雪球方式，募集現居北部地區願意分享其友誼關係細節的男性。國外不少研究提到年齡世代與異性關係對於男性情誼與情感表達的影響，故本研究選擇招募現處不同生命階段的受訪者，包括：求學單身、求學有伴侶、就業單身、就業有伴侶、已婚無子女、已婚有子女、離婚有子女等一共 17 位異性戀男性（表 1），企圖從不同生命階段的受訪者口中聽見更多元複數的異性戀男性情誼與男子氣概的建構歷程。最終本研究所招募到的受訪者為大學以上教育程度、目前的社會位階為中產階級，成長背景集中在藍領小康到中產，因此本研究可被視為聚焦於此群體的質性初探研究，其生命經驗並無法代表本土各階層的異性戀男性。

本研究之半結構深度訪談設計，目的是以生命歷程的視角，探索受訪者與同性友人互動之內容與細節，進而獲知其男子氣概建構的動態變化過程。訪談的前半段主要聚焦於受訪者與同性友人的交往情形，後半段則是側重於受訪者友誼發展經驗中所遭遇的各種性別規範限制與社會期待。筆者首先邀請受訪者回溯從小到大各生命階段（包括小學、中學、大學、研究所、當兵、工作、結婚、生育、離婚）同性情誼的互動內容，以及當時對其他同性交友圈的普遍觀察。多數受訪者小學階段的同性交友經驗已不復記憶，因此訪談中所蒐集到的資料多著重在中學以後的友誼故事。第二，筆者請受訪者從各階段中試著挑出幾位重要、記憶深刻的友人，進行個別友人互動經驗探討，以取得受訪者同性關係發展中更細緻、深入的互動情節。第三，筆者向受訪者提問：身為異男，在同性交友過程中曾經遭遇過的各式甘苦談。最後，筆者請受訪者回想自身以及身邊的同性友人通常如何處理負面情緒與挫折。

訪談流程基於研究倫理，受訪者被事先告知本研究之目的與訪談進行方式，每位受訪者的訪談時間大約一至二小時，通常於鄰近受訪者的咖啡廳舉行。儘管受訪者多屬自願報名參與本研究，面對筆者時頗能自在地侃侃而談，但是筆者身為女性的身分，某種程度上確實阻斷了受訪者深入分享與男性友人間討論身旁女性的情節，實為本研究之限制。

表 1：受訪者基本資料

姓名	年紀	職業	感情狀態	子女	學歷
T	19 歲	學生	單身	無	大學二年級
S	22 歲	學生	單身	無	大學二年級
B	23 歲	遊戲公司	單身	無	大學
W	25 歲	學生	有女友 (1 年半)	無	碩士班三年級
P	23 歲	電子商務公司	有女友 (3 年)	無	大學
G	26 歲	研究員	有女友 (4 年)	無	碩士
C	32 歲	補教業	有女友 (2 年)	無	大學
H	38 歲	船員	單身	無	大學
U	40 歲	教授	單身	無	博士
R	30 歲	國會助理	已婚 (2 年)	無	碩士
Y	33 歲	資訊業	已婚 (3 年)	無	博士
J	34 歲	設計業	已婚 (2 年半)	一男 (2 歲)	大學
M	40 歲	非營利組織	已婚 (9 年)	二女 (7、8 歲)	碩士
V	38 歲	藝術基金會	已婚 (3 年)	一男 (1 歲半)	碩士
O	43 歲	保險業經理	已婚 (11 年)	一男 (8 歲)	大學
F	48 歲	設計業	分居 (3 年半)	一女 (16 歲) 一男 (8 歲)	碩士
I	41 歲	零售業	離婚 (3 年)	二男 (6、4 歲)	碩士

本研究採主題分析方法 (thematic analysis)，其步驟包含：熟悉資料、初步譯碼、尋找主題、歸納主題、定義主題、詮釋主題。首先本研究將訪談資料轉譯成逐字稿，綜合田野筆記和觀察紀錄，進行反覆閱讀、持續比較。不同受訪者訪談文本中，不斷重複出現且具有共通性的內容，即為本研究所探尋的共同主題。本研究之訪談資料依照各生命階段先進行分類，並於每個階段下歸納出不同子題，爾後將類似的子題合併定義成為核心主題 (themes)，最末針對核心主題透過與理論對話的方式進行詮釋。書寫時，筆者以本研究整理歸納出來的不同生命階段核心主題，搭配代表性的訪談對話，具體地回應研究問題。

肆、直男的同性友誼互動樣貌：研究結果與分析

本研究之結果分為四個生命階段進行討論，筆者必須強調，此書寫架構並非意味著所有受訪者皆經歷「共同」的同性交友互動或男子

氣概形塑歷程。而是筆者梳理受訪者的生命經驗時發現，受訪者們雖然生長在不同的年代與環境，但其陳述中仍有重複浮現的、類似的同儕互動經驗及繼而產生的價值觀，故以之作為本研究結果呈現上的階段分類描述，概以下列四個主題標示。

一、中學時期：探索自我，模仿陽剛殘酷文化

多數受訪男性提及其中學時代摸索身分認同與自我價值的階段，容易出現複製霸權男子氣概所強調的男性典範：權力操控、否定弱者等行為，以致於同性之間的人際交往過度看重工具性與利用導向（instrumentality, Wood, 2015），明顯可見群體內階序的互動生態。受訪者期待經由反叛行為在群體生活中出鋒頭、形成人際連結。就算自己不是團體中的領導，多數受訪者也希望能夠跟隨團體中的意見領袖，一起參與各種結夥行動。目前大二的 T，父母都是上班族，自認跟父親與祖母特別親近，到現在遭遇迷惘，都還是會先找爸爸商量。國中以後 T 從基隆到新北市的私校宿讀，他提到自己國高中時期，和住校的好朋友熱衷於給教官找麻煩，舉凡半夜不睡覺集體用臉盆吃泡麵、違規闖入電腦教室打電玩遊戲、作弊等。結果雖然被記過、還要到校長室罰站十天，在 T 的口吻中都被形容成「違反校規好帥」的有趣回憶。而 R 高中時唸的是男校，經常發生同學之間私下模仿老師和教官、上課捉弄女老師、不服從老師規訓逕自走出教室等荒唐事跡。R 坦承當時的作為，都只為了在沉悶的求學環境中製造笑料、吸引他人目光，進而換取同學間的認同。

筆者認為這幾位受訪者青少年時與好友間的相處，不論是爭取團體中的領導位置或輔佐角色，其人際網絡的形成已初步顯現個人在團體中挑戰與競爭權力的霸權男子氣概發展。Ghail（1994）的經典研究亦指出，學校乃是最初生產父權意識形態與異性戀主義之地，男性的認同與團體向心力的建構往往必須犧牲其對師長、弱勢同學與女性的尊重，校園內的互動生活型態推動的是一種符合國家、社會文化的異性戀性／別常規與秩序。

本研究也發現，受訪者與國高中同學間的互動模式含雜著合作共生，同時相互競爭權力以求得生存資本。男性為了在團體內施展權力與控制，時而可見群起霸凌、排擠同儕的情事。R、I、G 分別指出，國高中（甚至到大學）階段班上較陰柔的男同學、書蟲經常被譏笑其

行為舉止不夠陽剛，他們被冠上「大媽」、「娘砲」等羞辱性綽號，成為被捉弄與製造笑果的對象（例如：桌椅被搬到廁所或書本被撕爛），好讓班上的強勢群體討一個全班哄堂大笑，同時展演一齣「我可以把力量發揮在他人身上」的殘酷練習（G）（青少年之間的男子氣概與霸凌行為討論請參見 Pascoe, 2005）。霸凌者透過將他人置於比自己更低的位階，以及犧牲弱勢的公開嘲弄，來建立或維繫自己在團體中的優越性與人際資本（郭怡伶，2005，頁 64；楊幸真，2010，頁 69）。

R 國小時住過板橋和三峽，後來考上臺北市的明星高中，為了省去每日的舟車勞頓，遂獨自一人到臺北來租房子。他進一步說明高中男校學生相處的生態：

一群男生在一起，蠻殘酷的，就是在於你有多少能耐啊！可是我覺得根本上去定義你在班上的位置，或是說你跟朋友之間的關係在於你是不是成績好，你是不是體育好，你是不是，在一些方面很有 sense，或者是說你是不是有什麼特別吸引人的地方等等的，那當你不具備這些東西的時候，我覺得就是你的人際關係可能會比較危險的時候。（R）

由此可知，學科知識與體育表現乃是影響男中學生霸權男子氣概學習與實踐的根本關鍵（楊幸真，2012），華人文化對男性的「文武精神」要求與期待，體現在當代男性的學術表現與運動能力上（Louie, 2002）。中學男孩從成績排名首先理解競爭的重要，若是功課表現優秀也擅長運動項目，則更容易受老師疼愛，在班上掌握影響力與話語權。如 G 所言：「功課好，會被包庇，老師會包庇你，甚至處罰和層級會跟別人不一樣」。

然而，在學校裡表現太優秀也可能會遭同儕挑戰。G 和 M 都提到自己國高中時成績很好，但不代表在學校不會被同學找麻煩。剛踏入職場的 G 從小在臺中長大，曾經就讀「戰鬥國中」，笑言自己是含著「木湯匙」出身。他認為在那樣的求學環境，「幫派」是一種很重要的保護罩與歸屬。G 坦言，身為老師的母親也曾放棄過自己，每次打完架之後他也不清楚意義為何，只是覺得好玩，自己當時面臨「不是你欺負別人，就是被別人欺負」的現實。G 曾無知地跟著欺負弱

小，但高中之後，G 開始在幫派裡提供「公共財」，公共財在此指的不是金錢，而是提供大家在校內外能夠抵抗幫派尋仇的技能，其中也包括如何追求女生。換言之，男孩在成為男人的過程中，除了必須符合主流社會對男性「能力」、「知識權威」展現的期待，該論述亦設定男性在與異性交往和性知識上必須具有主動和支配的權力，因此與同學間談論和異性關係相關的知識及實作經驗，遂成為一種向他人展現自己比其他人更瞭解異性與性的展示，藉以鞏固自身於團體中的地位（楊幸真，2012）。

雖然受訪者 C, B, R 中學時期或多或少存有恐同心態，但隨著後來人生中經歷的意外、低潮以及認知上的拓展，讓他們比較願意去同理、接納同志的弱勢處境。受訪者 C 因為與女同學相處融洽，屢屢受到女同學的「護花使者」們所排擠，從國中到大學只能跟班上的其他邊緣男生自成一群。C 出社會工作之前有過幾次被男同志告白、甚至被突然環抱的陰影，因此過去害怕與男同志有太多交流。他目前是補習班的高中輔導老師，曾經，有一位男學生前一天還跟他勾肩搭背，隔天就不幸輕生：

我覺得心境上真的變化很大……我是在後來從新聞、從家長那才知道〔他是同志〕，原來〔學生〕的性向不被家人所認同。所以從那之後我就會開玩笑的問每個男生、每個女生「喂，你是不是 gay？」真的讓我找到這樣的人，我會特別建立起一個橋樑，去關心他們、去在乎他們，讓他們知道他們的這種心事，人家是能認同的。（C）

學生逝去的重大打擊促使 C 從以往對同志的排斥，轉而願意主動關懷這樣的學生。B 大學時走出情傷憂鬱之後，也發現自己慢慢願意與男同志同學深入交往，因為「我們永遠不知道未來會發生什麼事情」，所以不如敞開心胸去探索這個世界。R 則是在研究所時修了性別相關課程，因此當研究所同學寫信向他出櫃時，他雖訝異自己事前完全沒有察覺，但之後與友人的關係也變得更加密切。

二、大學時期：以脫單證明男性魅力

多數受訪者都提及自己大學時期以經營異性親密關係為生活重

心，選擇暫時將同性友人「放生」（R）。J 生長在高雄，父親從事黨營媒體事業，家庭風氣保守，從小被歸類為文靜派，自覺男女特質兼具。他表示，「成家立業」對本土男性來說是天經地義的事，他與大學同學之間不假思索地遵循著這個目標；伴侶優先成了男性間不用說出口的一種「默契」，朋友之間幾乎都能互相體諒。身為藍領家庭三兄弟中的老大，U 小時候需兼顧兩個弟弟的學業及打掃家裡環境，他在成為一名大學教授前其實是位運動員，他認為尋找異性伴侶對年輕男性而言相對重要，「甚至比同性朋友還重要」。男性友人相約打球，互相較量球技的同時，也會互相比較是否有交往的對象，甚至會比較交往過的異性數目。如同其他性傾向的群體，M 認為異性戀男性上大學後普遍致力於「脫單」，單身的男性雖然嘴巴上會抱怨其他同學以女友為重，但事實上也認同有伴侶的男性應該以異性為生活重心。M 直言，積極追求異性對直男同儕而言有一種「證明自己是正常、具吸引力男性的意義」。

受訪者往往失戀的時候，才會上網發文向同性友人求救。B 是臺南人，曾經在高雄和臺北求學，大學時期開始打工賺錢幫忙家裡償還房貸。他與家人的關係雖然緊密，但是從小耳濡目染的家庭教育傾向壓抑、不輕易表達情感。大二時 B 因為和長年交往的高中時代女友分手而幾乎患上憂鬱症，當時心靈快要溺水的他只能上網發失戀文紓解。家住附近的男同學看到他的求救文遂定期約他吃飯、登山、散步聊天；學校打工的學長及其伴侶也見文主動照顧他、定時嘘寒問暖。這些溫暖的舉動令 B 至今仍銘感在心。此外，R 也談到自己有了固定交往對象之後，反而疏遠了高中、大學時期的好友「高個」。後來就算再見面，也無法向高個表達自己內心對他的陪伴與珍惜之情：

〔高個〕是一個可信任的人，我就覺得，默默會對他有點虧欠吧，就覺得，我很謝謝他，但是，其實男生之間不會講這些啦，不會說欸，「真的很謝謝你陪我走過，這麼一段生命，通常不會這樣講」，通常見到面第一句話就是損對方。我還記得像之前我辦婚宴他也有來啊，然後他就是，反正就是也是穿的還蠻不錯這樣，噢我看到他第一句話就是，「噢高個，穿得比我還帥！」就是會去損他這樣子，就是講一些很靠北的話這樣，不會真的去對對方表露說，其實你對

我很重要喔，或者說我很珍惜有你這樣的朋友（R）

早期西方的研究指出，女性通常只有在被追求時才會被男性擺在重要的位置，一旦追到手，異性關係和男性的同性情誼相較，容易變得次要（Ghail, 1994）。Flood（2008）的軍中男性研究也顯示，西方傳統霸權式男子氣概的「兄弟至上」之情，遠遠超越這些軍人的異性親密關係。反觀本研究，以上幾位受訪者皆表示大學，乃至於到後來服兵役，實踐的是以「異性戀伴侶為重」的生活型態，和同性友人之間如 Wood（2015）的研究所示，通常都以貶損、戲謔來掩蓋內心的情感。相較於西方人士將兄弟擺第一的同性交友模式，筆者認為受訪者進入大學後積極追求異性伴侶之舉仍是服膺以戀愛關係、身旁異性多寡來顯現自身具備「正常」男性魅力的主流霸權男子氣概腳本。韓國教師兼作家崔乘範（2008／龔苾瑄譯，2020，頁 20）也指出，男人們用盡力氣交一個「能見人」的女友，其實是為了得到其他男性的認同，如此才能成為「真男人」，獲取同性友愛。當然亦可能如朱偉誠（2015）所指，受訪者欠缺同性間表達親密之愛的符碼與腳本，導致與人建立親密感的慾望只能從異性關係中尋求與滿足。

P 小時候在永和成長，國小時因為身材豐碩的關係，與女同學較為友好，在家裡也跟媽媽和妹妹特別親近，笑稱自己在女人堆裡長大，偏好中性服飾；國中長高變瘦之後，才開始結交同性朋友。值得一提的是，陰柔氣質的異男 P 將自己的女同志同學視為可以自然傾訴、依靠、與構築親密的「同性」對象。P 自認與這位偏陽剛氣質的女同學非常要好，他強調自己喜歡和帥氣的女生交朋友，不在乎這位同志同學是什麼性別。

有一次我〔因為某個活動必須放棄球賽〕，然後那一天下午我在上古文課的時候，就很生氣，然後就整個心情很糟，她也知道這件事，她就坐在我旁邊。然後那時候我就決定我要翹課去臺大打球，可是我身上什麼都沒帶，然後我也不能帶著包包就走出去，我就跟她講說我要去臺大打球，你可以幫我拿包包嗎？然後她就這樣看我，然後就說你身上有帶錢嗎？我就說我有帶悠遊卡，悠遊卡有錢。她說好那你去，她就幫我拿我丟在那邊的包包這樣。……我就是很喜歡

這個人，然後很喜歡跟她相處的時候自己是被袒護的那種感覺。……我覺得我自己是蠻女性化特質，她就是個性有點帥的女生，就會變成是有一點像是我們的性別角色顛倒，然後我就會很常就是賴著她，跟她講一些有的沒有的，她就都會翻白眼，可是都會默許我做這些事情。（P）

P 在訪談中不斷指出自己對於女同志友人的好感，及能夠自在地透過語言和擁抱向她表達親密之情。但是細究 P 的說法卻不難發現，與男同學相處時，他其實非常期待自己能成為眾所矚目的對象；他偏好團隊競賽，喜愛與男同學一起進行重量訓練，較量男性陽剛之美。P 提到自己崇拜多才多藝的男生，熱衷運動、健身、偏競爭性的活動。

就我那時候有一個崇拜的同學，因為他就是一個十項全能，他除了長得不高之外，就是十項全能，從運動音樂，該會的東西他都會，然後不該會的他大概也都會這樣，而且那時候他排球打得很好，所以我就很崇拜他。……我打排球是很競技取向，我就是喜歡比賽，我喜歡得分，喜歡贏。……然後〔我與男同學〕就常在比賽的時候，包含打電玩的時候，我就有些情緒。（P）

我覺得男生的交往是非常簡單，而且粗暴的，就是他有很大的容錯空間，你可以不小心踩到線，再退回來，他就會說你剛剛那樣不好，他會直接跟你講，但是異性的話她就會懷恨在她的心裡，慢慢累積然後爆開這樣，我覺得真的是男生跟女生差很多的地方。……我覺得男生的交往有時候，他不是很能理解你為什麼這樣想，就是他不是很能了解你那些很細膩的情緒，他只會覺得我就是把事情解決了不就好嗎？那你現在在那邊講那些有什麼用？（P）

訪談時，筆者明顯感受到 P 欲「往同志靠攏」（very gay straight, Bridges, 2014），不斷流露出一種「少年花美男」（楊幸真，2012）的形象：偏愛亞洲偶像明星般的中性時尚潮流，同時展現同志友善、陰柔的性別氣息。但另一方面，筆者亦觀察到 P 似乎符合西方文獻所言：「形式多於實質」（more style than substance, Messner, 1993），

雖然對於多元的性別表現與氣質採包容接納的態度，但實際上仍存有區隔優越與弱勢男性、強調男女差異與性別二分、積極追求異性戀男性陽剛競爭文化的幽微雜揉（hybridization）矛盾心態。

三、當兵、步入職場：結盟競爭，被期待優秀又被當成威脅的矛盾男子氣概

好幾位受訪者指出，服兵役其實就是一種「大家不得不湊在一起」的感覺。當下與同僚好似會產生共患難的情誼，但退伍後就鳥獸散，各自回到自己的同溫層；類似一種工具性的關係，只為了暫時在軍隊裡求生存。

我在軍隊就看到一堆學長他們會去……單身就會一直去嫖，吃喝嫖賭這些都有。我就會覺得這樣的風氣，這樣的生活，這樣的人生，感覺很沒有意義。在那 11 個月裡你們會有所謂的革命情感，講得好像赴湯蹈火在所不辭什麼的，一退伍之後就什麼都沒有，過眼雲煙就不聯絡了。好像感覺一開始還想試著去聯絡，到後來就完全斷交。我們是一群不同價值觀的男生，被強迫逼在一個要有相同價值觀的一個環境裡相處，所以我們會產生「好像我們都是有相同想法的人」，但是我們從這個牢籠出去之後各自飛，各自的價值觀又重新產生，那就當然，你跟我不是同一國了。（C）

臺灣的當兵文化因為民主化與時代的推進，已不若過去具備成年禮的性質。男性在軍隊中被迫進入以資歷區分的學長學弟制，送煙敬酒、一起增加性經驗等儀式，充其量只是掩飾彼此之間的差異，以經營維繫軍中男性的群體共感（高穎超，2006）。

多數受訪者同意，男性進入軍隊與職場後的競爭與利害關係變得更加明顯。這也是 O 一直覺得自己無法與同性深交的原因：「因為無法敞開心胸講事情，但這也因為男性之間會愛面子、比較」。換言之，男性被期待有競爭力，但是有了競爭力又被當成是威脅。M 生在父母皆為公務員的高雄家庭，傳統守舊的父親總是對他嚴厲苛求，不管他在學業上的表現多傑出，父親卻鮮有讚美。不過父親的嚴格規訓也使他比起同儕更為成熟、進退有度，從求學開始就經常被當成威脅

或競爭對象。細心、辦事牢靠的 M 經常受到軍中長官優待：容易請假，不用出操，甚至被當成寵兒。這樣的結果卻造成他與平級士官之間產生競爭關係：

當兵對男性來講是共同話題，也是某種證明我也是符合，我也是有「傷口」。但是又很弔詭，當兵本來是為了展示我的雄性氣概，但是實際上我們〔和平級士官之間〕在談論的卻是誰比較爽，就是大家其實是在逃避這個經驗，但是又很喜歡拿這個經驗出來說嘴。所以如果被平輩認為你過得比較爽，就會被認為你那個雄性氣概是假的，「你不夠」這樣。那時候就會出現競爭關係。（M）

洞悉軍隊結構性階序文化的 M，學習適時地在「武人」的環境下利用自身的「文人」利器與人際籌碼，與上級進退協商，以提供連上弟兄下屬們「好處」：某次 M 槓上平級的連長，後來靠著與上級友好的關係，成功地為連上弟兄爭取撤銷連坐懲罰。該事件之後，M 明顯發現連上弟兄對他態度加倍友善。如文獻所示，校園和軍中充滿著內部階級劃分的競爭與考驗，無論是考試成績、體育競賽、對群體有無利害關係，都是劃分人際高低階序的標準，致使團體內的個人獲取不同的社會資本，亦關係著個人所處群體生活是否能夠安穩平順（高穎超，2006；畢恆達等，2017；Bih & Huang, 2012）。

另一種受訪者提及的男性同儕競爭模式是透過集結同盟與排除弱者。G 認為，進入職場後的友誼背後反映的是對於人際結盟的慾望，依舊不脫菁英男性必須要聯合起來成就大事的心理機制。因此，目前 G 身邊的朋友都是學者黃淑玲與白爾雅（2018）所謂的現代文人菁英分子，如醫師、金融分析師、律師，其他不在這個階級位置的人都被他排除在好友圈之外。

不是同一個世界的人，我會把他們排除在我的交友圈外，就是他們會被我剔除掉，不會再跟他們有更多的聯絡。那留下來的人都是我覺得很長進，或很優秀的同學或朋友。他們也都為了一個我覺得，為了一個夢想正在打拼，然後我們彼此都是所謂的，就是「夢想的追逐者」。那在這個路上我們都會一起打氣，一起支援對方，然後我會希望我身邊的

朋友都是一群優秀的人，菁英圈這樣，……然後我們已經把這個群體建立成一個很強大的戰鬥團隊。(G)

G 從學生時代的結盟經驗體會到群體集結的力量，提及自己對成功的定義，G 答到：「沒有上限，權力越多越好，金錢越多越好。」理性上 G 很清楚這個社會對男性的要求過高，他和朋友圈只是在追逐一個成功的標籤，但他仍然矛盾與無奈地執著於此。

同樣地，家境優渥，從高中到碩士班一路就讀名校，目前自己創業成為經營者的 I 提到，進入職場之後，大學、研究所同學很明顯會彼此競爭，甚至很現實地被分成「事業發展領先組」與「事業發展落後組」。成就高的同學會排擠成就低的同學，認為對方「很廢」、「領死薪水」，沒有彼此聊天見面的必要。而事業發展落後的同學也會在被其他人貶抑之後，自動消失在同學圈之中。還會留在朋友圈裡的人，通常是發展中等的人。而能力較不突出、缺乏陽剛競爭特質的同學或同事，因為少了共同達成成就表現、互添光環的利用價值，遂被排除於社會網絡之外（參見孫志硯，2008）。

當工作或感情上遭遇挫折時，受訪者幾乎都會轉向身旁的同性支持系統。F 出生在越南，因為父親做生意的關係，在香港長大，中學時期才隨從軍的爺爺移民到臺灣。他在訪談中表達同性好友間對於事業與愛情表現上的互相支持非常重要，他稱自己和好友間像「沒有掛牌的神父」，只要遭遇困難便像「呼叫蝙蝠俠或是超人」一般，將好友們集合起來唱歌喝酒、大吐苦水。G、J 與 I 提到自己習慣將朋友分類，尋找「聽得懂」的人討論生活上的難題，有的人適合談感情，有的人適合談人生未來。

我會找以前的同學，互相聊一聊這樣子。當然他有他的問題，我有我的問題，只是說我現在如果要講比較需要別人建議的問題的話，不會是群體，是 one by one。然後你會選擇目標，這個人也許可能可以解決你現在這個問題，然後他可以理解你現在的問題。(J)

有些受訪者雖然不會如傳統男性一般把苦往肚裡吞，但是其揭露心事的對象卻僅限於異性。R 除了無法向死黨高個表達友愛之外，他也發現自己：「有些話不會跟男生說，但是跟女生就很自然而然，心

裡的話啊，人生未來的規畫啊。」類似的情況也發生在 P 與 M 身上，M 自詡擅長說理，但因為從小在嚴父鋼鐵般的教養之下，逐漸失去向他人表達情感的能力，甚至以「情感表達上被去勢」來形容自己無法向太太以外的人自我揭露，更遑論是向同性朋友表現真情，因為「只有面對太太時才能放鬆，不需要偽裝、自在地展現」。J 雖然自認頗具女性特質且擅長傾聽，在同性朋友間時常扮演協調者的角色，但他與前文中的 R 同樣強調男性之間的感情不能隨便表達，而是會因為在乎這個朋友而透過不同的語言：髒話、責備（例如：幹，超無聊好不好！你不要想太多好嗎？），來表示對朋友的關心和期望。

男生的感情是表現在一起行動上，然後頂多最後說「謝謝你」。……假設某人心情不好找我去看海，我聽完他講話之後，他可能就會說：「謝謝你今天陪我來」，就這樣子。因為他本來就知道我是可以放心的對象啊，他不會去表達說：「我真的很喜歡你陪我來」。對，只會就事實來評論。……我不會主動去表達我對男性朋友的感情，對談戀愛的人就 ok。（J）

O 的父親在工廠上班，是個標準的嚴父，不太會在言語上關心他和弟弟，但會透過行動讓他們感到安心。O 認為男性無法向同性敞開心胸，與揭露心事後無法得到期待的安慰與解決途徑有關。

男生，當他說出一個困難的時候，他想得到解決方案。但，大部分的困難，其實你很難從別人嘴裡聽到真正能夠解決問題的方案。其實很少，包含感情包含家庭，都是別人的事情，你提供任何的方案都不能夠真正解決問題。所以通常男生跟男生，如果講心裡不舒服的什麼事情的時候，他只會跟你講：「我們來喝酒唱歌啦（臺語）」！我們用其他方式，忘掉這些事情，但他其實並沒有真正幫我解決掉這件事啊。其實，你把我拖去喝酒，你把我拖去抽菸，幹嘛幹嘛，其實沒有解決我的問題。那，那我跟你講這個幹嘛？所以我寧可選擇跟女生講，女生她會聽，然後安慰，可是男生不太會安慰我，很難啊！（O）

不過，女性也不見得都是男性示弱的最佳傾訴對象，F 分居中的太太從前不管面對他的成功或失敗都是一種「so what? 是不是你自己的問題？」的冷漠回應，反而是他挫折的主要來源。換言之，男性並非沒有表達與分享的需求，而是男性之間表達情感與安慰的形式與對象有別。男人同性間的回饋主要透過行動，較缺乏柔性言語安慰的功能，既然說出自己的心事不見得能得到解決的方法，又不能得到想要的心理慰藉，甚至討來一頓罵，那倒不如不說。

四、結婚之後：重新尋回自我認同中的非傳統男子氣概

受訪者強調，結婚後要特別為同性朋友空出時間來相聚其實相當不容易，所以能持續維持見面的朋友真的很難得。V 很坦白地說：「結婚有小孩後的友情維繫其實蠻困難的，去哪都要帶著小孩，有些人就會放棄約不出來了」。與太太分居以後的 F，多數時間都花在工作與陪伴小孩與原生父母，比較難挪出時間與同性朋友相見，遂以臉書互動保持友誼。O 說自己婚後只有家庭，現在很少單獨與朋友見面，少數拜訪大學男同學的機會都是利用出差的空檔。平時外出幾乎都是攜家帶眷，目前比較有往來的男性朋友都是太太那邊介紹的朋友。雖然想花時間跟家人在一起是他自己的選擇，但 O 在訪談過程中也不免提起自己當兵時期的同僚無以繼續保持聯繫的遺憾。這樣的情緒暗示著男性對愛情、友情的權衡可能會隨著生命階段的改變，產生觀念上的轉折。

受訪者 Y 本為馬來西亞華人，來臺定居生活已經 18 年，閩南語說得比多數臺灣人都好，太太也是臺灣人。小時候父親從事小生意，對他的要求與訓誡頗多，童年與媽媽相處時間較長，兩個哥哥因為年紀的差距反而疏遠。Y 在婚後試圖平衡交友與家庭，他坦言自己和女朋友交往時比較容易忽略朋友，但是成家之後，因為與同性朋友無法經常見面，於是他嘗試將太太拉進朋友圈，讓太太也喜歡自己的朋友，甚至樂於和自己的男性朋友一起出遊，以此作為同時享受友情和家庭的平衡策略。有趣的是，最近 Magrath & Scoats (2019) 發現，其研究中的中年男性後悔年輕時並未盡力維持其同性情誼，現在卻期待自己下半輩子和其他同性朋友能夠一起同居生活。

筆者發現受訪者與同性友人的互動交往，隨著人生歷練的增長與反思，不乏可見異於傳統陽剛霸權男子氣概傾向的其他男子氣概實

踐。M 表示自己在婚後有慢慢步入「越來越知道自己是誰」的路上。M 的喜好與價值觀與一般男性不同，當其他人忙著講投資理財時，自己卻鍾情於藝文話題，於是和同性朋友相處時往往會有話不投機之感，與太太教會裡的女同志朋友反而比較契合。成長過程目睹父親家暴母親，讓 M 以「性別平等」為人生的重要價值目標，除了支持太太投入事業，平時也主責接送孩子上學及每週一次的晚餐準備。M 於訪談時感嘆，如果自己生的是兒子，「一定會用跳脫社會框架的方式養育他」。

受訪者 C、V 則是鍾情獨立自主的女性，渴望在家當「家庭主夫」。V 的父母都是上班族，大學時雙親離異。小學時他因為患有氣喘，特別瘦弱，也因為如此至今仍有缺乏自信的困擾。V 高中時期發現哥哥是同志，因此主動對多元性傾向進行探索，並從一無所知轉為支持同志。後來就算自己和男同學因為過度親密而讓女朋友吃醋，且被同事誤會成同志情侶，他倆也絲毫不避諱。現在 V 即使進入婚姻，也會定期跟學生時代的死黨相約一起出門帶小孩，討論爸爸經。

〔高中時死黨〕也教我騎摩托車，到了大學又一起在同一間麵包店打工，又在同一間餐廳打工。後來他研究所到臺中唸書，可是我們還是都有聯絡。再後來我到日本工作，也一直都有聯絡，到現在都有聯絡這樣。前陣子我們還兩個奶爸，他帶他女兒大概不到一歲，然後我兒子一歲多，我們一起去看燈會。因為他老婆去員工旅遊兩個禮拜，我們兩個帶小孩的奶爸就自己出去，喝奶爸下午茶、喝酒。（V）

仔細比較 V 與好友之間的互動關係及本文前述所討論的「包容型男子氣概」與「兄弟情」的概念，確實有相近之處。不論是語言表達或是肢體碰觸，V 在在跳脫傳統異性戀男性恐懼同性戀的框架。訪談時筆者剛好見到 V 的太太下班後來接小孩（V 帶著一歲多的小孩來參與訪談），所以短暫觀察到 V 對長期加班的妻子所表現的關注與不捨。V 提到自己跟太太相反，自己是那個什麼都會拿出來講的人，身為家中長女的太太反而遇到挫折總是獨自吞忍。尤其是提到近期罹患癌症的日籍好友，V 表示自己和日籍友人之間的關係像無話不談的兄弟（近似於“lack of boundaries”的概念，Robinson et al., 2017），當他在電

話中得知好友生病時，V 毫不掩飾地表達自己忍不住哭了起來。

可惜的是，V 和 C 對於個人成就（在家育兒）的非傳統觀念仍受社會性別規範所束縛。他們對於自己擔任家庭管理者與「全力照顧型」父親（林東龍、劉蕙雯，2016）的夢想一直因為親人、伴侶和某些朋友的異樣眼光而遲遲無法完整實現。

我一直覺得很難過的是，很希望可以「家庭主夫」這樣的東西，那臺灣對於家庭主夫，會覺得他是吃軟飯、小白臉，甚至會覺得「為什麼你是男生，你不去工作？」就是在臺灣這種東西不常見，拿出來講你會被人家笑，甚至你的親戚會看不起你，會說「你為什麼靠老婆在養？」所以我覺得臺灣最大的問題是，這一段青黃不接的中年人，什麼時候可以趕快散去，把他們淘汰掉，其實很多年輕人已經願意去接受男女平等這件事，我覺得這是 OK 的。但是因為上面一直卡著某一個世代的人，他不願意轉變觀念的人，你們會被迫壓抑，不能去突破，因為你突破之後那些親戚會聯合你的爸媽，聯合你身邊的所有力量，去抵制你。……但有時候你做了改變之後，得到人家的反饋是讓你受傷的，你會縮回來，變得漠視這件事。（C）

換言之，C、V 雖然願意挑戰傳統的性別角色刻板印象，卻掙脫不了「雜揉式男子氣概父職觀念」的獵殺：男性可以「幫忙」照顧小孩，但是不能負擔家計的男性，不是「真的男人」，也不是真的好爸爸（類似的討論請見 Randles, 2018），結果 C、V 只能在個人與臺灣社會性別期待下，如王大維與郭麗安（2012）研究中的受訪者一般，在兩種自我主體之間不斷抵抗與游移。C 甚至因為自己無法如願主責家庭，而開始產生臺灣男性「越來越卑微」，這個社會比較優待女性的「母豬教」（余貞誼，2016）心態，忽略了男性與女性同受父權體制壓迫的同理與反省。綜觀上述，受訪者們在訪談過程中所揭露的同儕互動內容重新定義了當代男子氣概對於個人成就、性別角色展演與多元性傾向的認同。隨著成長過程中的經歷與學習，似乎可見性別平等、包容型男子氣概之轉型軌跡。

伍、結論：直男同性友誼中之男子氣概建構與轉變

本研究從異性戀男性同性友誼之人際交往脈絡，探究其中學、大學、當兵與就業、及婚後各生命階段，男性間互動往來與男子氣概發展相互形塑之變動歷程。受訪者於中學時期展開對於自我認同的探索，傾向以學業成績、體育表現、及團體結盟等方式仿製主流霸權式男子氣概；上大學以後成績排名不再是直男們跟同學間比較的重點，反倒是與異性之間的關係成為友誼之外的生活重心，以博取男性友人的認同；當兵與工作階段，男性被期待優秀的同時也被視為一種威脅，因此同性間（被迫）出現相互矛盾、無奈的權力結盟競爭型男子氣概；進入婚姻之後，隨著生育、家庭組成的變化，有些受訪者對於非傳統的性別角色認同，顯得更為包容而有彈性。整體而言，相較於年少時期，多數受訪者目前泰半較能接受社會上存在的多元性別認同，同性朋友之間也能透過言語表達，互相排解煩憂，即便有些人示弱的對象僅限於女性。整體而言，受訪者隨著生命階段中積累各種關係碰撞，其男子氣概建構呈現由霸權、共謀式男子氣概出發，逐步朝包容、性別平等解構與轉型的跡象。筆者進一步比較研究結果與現有文獻後發掘：

一、中壯年受訪者展現反思與解構霸權男子氣概的能動性：回應 Connell & Messerschmidt (2005)、Haywood et al. (2017) 對於差異與交織性 (intersectionality) 的提醒，筆者認同除了性傾向之外，男子氣概的建構必須被放在階級、年齡世代等多重座標軸線下加以省視。本研究的受訪者目前位居中產，其成長環境集中於北部、藍領小康到中產階層，故從比較明顯的年齡差異觀之，筆者發現與國內外年輕男性研究不同的是，三十歲以下未婚的六位青年受訪者似乎更容易受霸權型、無法示弱的男子氣概左右其性別實踐。例如 S 曾經遭逢摯友罹癌去世的巨變，這般常人難以承受的傷痛，他選擇以運動、自己騎車去看海的方式獨自承擔，據他所言，「有時候事情講出來，別人沒有辦法幫你解決」，或是「你今天跟他講以後，隔兩天大家都知道了」。另外，倘若失戀 T 也都是自我埋藏，很少跟別人講，「畢竟是自己的事情啊，自己覺得很丟臉吧」；他的解憂之道是自己去看電影，讓心情放輕鬆。而 G 則如本文前述所描繪，一直困在男性被期待的成就、地位競逐等認同壓力之中。

我的人生經歷或遭遇是蠻特殊的，不是任何一個人都可以理解的，那包括我的工作，我的生活，那我都選擇一個人吞，其實我朋友們可能只能負擔百分之三十、百分之四十。喔還有，我這群朋友們全部都有很嚴重的自律神經失調，我們都有在吃藥。…可是我只要一結束工作或什麼的，我就會想要再做其他的事情，要不停地讓自己變更强，可是我覺得這樣好像真的不快樂。（G）

不同的是，三十歲以上進入職場、婚姻的中壯年受訪者在遭遇某些經歷後，明顯表達對男性之間的權力競爭感到疲憊與無奈，有些期待能重拾過去曾有過的重要同性友誼，適度表達內心情感，對於身旁同志友人的態度亦轉為友善，甚至主動表示希望留守家庭照顧子女。至此，筆者發掘青年受訪者相較於中壯年的受訪者，尚未形成解構陽剛霸權、重新定義當代男子氣概的資本與彈性。究其因，受訪者 M 指出，自己一直對於男性間的談話模式興趣缺缺：「男人不是互相炫耀成就，就是講女人」，然而年輕時候的 M 因為缺乏經濟與社會資本，為了安全起見，只能配合其他人，選擇阻力最小的路：

因為選擇不同要付出代價，我是一直到婚後，甚至真正全職做自己了，才完全放下那些被認同的壓力。……父親決定了男孩的光譜起點，但孩子本身可以有能動性反抗，也會因為資本的累積而有更寬闊的空間。我因為一直學業很好，或因為某些特質對我的資本累積有幫助，而可以守住不那麼傳統男性的特質。（M）

此外，畢恆達（2003）的研究顯示，男性性別平等意識之形成多半與質疑自身傳統男性的角色而遭束縛或壓迫、追隨傳統男性氣概建構但因性別價值轉變反被身旁女性質疑或挑戰、及身旁重要女性受壓迫等經驗有關。

男人要談論性別，自身經驗就必須時時受到檢驗。如果沒有切身的經驗來支持，很難對性別論述有持續的投入。（畢恆達，2003，頁 79）

劉家鈞、郭麗安、王沂釗（2009）亦有類似的研究發現：已婚男性的性別意識起源與教育訓練、觀察學習、生活中日擊不平等事件，以及認同女性的能力有關。這些經驗必須透過階段式累積，且不必然能形成性別平等意識。本研究中三十歲以下的青年受訪者，似乎較少提及上述經驗，倒是中壯年涉世後的受訪者如 M 目睹受家暴的母親，C、V 的非傳統男性角色受挫，與 R 曾修習性別相關課程並親見男同志同學所遭受的不平等待遇，才開始體察社會上的性別不正義，萌發挑戰傳統霸權式男子氣概的傾向。不過，中壯年受訪者所衍生的反思，不見得僅僅因為累積、目睹性別不平等經驗，也可能是因為臺灣眼前的時代，大環境上正巧適逢性別運動相當蓬勃的時刻，例如：臺灣過去幾年一連串的同婚運動，因此加總所有的因素，激發了這些較為年長的受訪者更願意展現出解構霸權男子氣概的想法與行動力。此外，筆者擔憂類似的男性性別不平等挫敗經驗如果沒能獲得適當的回應或解構，也可能像 C 一般因為無法爭取、協商自身的性別認同實踐與非傳統的男子氣概定位，進而產生怪罪女性的不平衡心態，反倒可能發展成性別平等意識之反挫。

二、異男同性間對彼此的情感表達仍是禁忌：西方研究（de Boise, 2015; Bridges, 2014; Pfaffendorf, 2017）不斷提醒我們，中產階級年輕世代男性只見其同儕互動「形式」上的轉變，而不見具體針對性別壓迫的解構與反省（Messner, 1993 對 IMT 的批判）。本研究的受訪者在遭遇挫折時，不乏可見如包容型男子氣概、兄弟情等研究所示，願意主動揭露自我內心的困頓。但也有不少受訪男性仍然無法向同儕示弱，如 O、P、R 所言，就算訴苦也要找女性才能得到安慰。此外，受訪者向友人傾訴的話題內容大都圍繞在「工作與愛情」，但是異性戀男性之間對彼此的感情、珍惜甚至是錯過聯繫後的惋惜之情，仍然是同性朋友間表達上的障礙。如畢恆達等人（2017，頁 36）的研究所示，臺灣的青少年男性之間需要建立親密，但是卻不可能說出「好喜歡你」，於是只能用嬉鬧的方式來互相示好，深怕同性情誼與同性戀之間的界線畫得不夠清楚。而這份說不出口的親密感，或是必須透過間接形式表達（如：貶損、髒話、互相嘲笑、阿魯巴）的直男同性溝通文化，再次凸顯了本土異男之間盡力維護的剛強形象，同時欠缺表達相互情感與適切回應的溝通知能。

總的來說，本研究與過往本土男子氣概文獻不同之處，不在概念

化新的男子氣概類型或語彙，而是從關係互動的視角凸顯出男子氣概隨著生命階段不斷變動、來回協商的過程。本研究肯認其他男性研究學者所指，男子氣概乃是一種複數的形式；它是一個非線性、依不同時空背景、社會情境、人際關係脈絡，與互動對象共同建構發展而成的複雜傾向（畢恆達，2003；Connell, 2003, 2005）。個體在不同生命階段中可能因為自身所擁有的能力與資本，協商出不同樣貌的複數男子氣概趨勢，端看其所遭遇的情境與溝通對象的回饋；個人可能同時存在多樣且相互矛盾的男子氣概。綜觀受訪者的生命經驗，雖然不是每一位都明顯呈現出男子氣概趨勢的動態轉變，但值得慶幸的是，仍有幾位受訪者隱約透露自身在接納多元性別的脈絡上，由保守霸權轉向性別平等、包容型男子氣概的傾向。本研究中的青年受訪者雖然目前仍偏向傳統霸權型男子氣概，但透過生命經驗的不斷折衝與協商，未來其男子氣概朝向多元、性別平等男子氣概轉型的趨勢或可期待。本研究的意義如同受訪者 M 所言，如果能有越來越多非傳統男性為自己撐出性別角色發展空間的實例能夠被看見，那麼直男們才越能夠安心地展現出自己原來的模樣。

註釋

- 1 直男，指的是異性戀男性。該文詳細內容，請參閱 <http://cn.nystyle.com/style/20161021/man-date/zh-hant/>。
- 2 本研究主要探討異性戀男性的處境，故以下文中所出現的「男性」，皆指異性戀，除非有特別標寫出同性戀男性。
- 3 這幾篇文章分別出自紐約時報 “The challenges of male friendships” http://well.blogs.nytimes.com/2016/06/27/the-challenges-of-male-friendships/?_r=2；華爾街日報 “Friendship for guys (no tears!)” <http://www.wsj.com/articles/SB10001424052702304620304575166090090482912>；以及 Upworthy 網路新聞平臺 “Men and women do friendship differently. Maybe it’s time for that to change.” <http://www.upworthy.com/men-and-women-do-friendship-differently-maybe-its-time-for-that-to-change>。
- 4 根據郭怡伶（2005，頁 6）的研究，「阿魯巴亦做『aruba』；其英文寫法，也是另一個廣泛流傳及常使用的稱呼。阿魯巴的動作是一群男生抓著、抬起某個男同學，以胯下性器官對準硬物加以

撞擊、磨蹭或加上其他的動作。而最古典、普遍的硬物是校園中最常見的樹木，舉凡椰子樹、榕樹、木棉樹都可以是使用的對象。近年來，阿魯巴發展了不少的招式，目標物也越來越多，校園、教室裡常見的物品都可以是阿魯巴的目標物。」

參考文獻

- 王大維、郭麗安（2012）。〈在言談中做男人？—運用論述心理學方法分析男性氣概建構之初探研究〉，女學會、張盈堃、吳嘉麗編《陽剛氣質：國外論述與臺灣經驗》，頁3-42。臺北：巨流。
- 朱偉誠（2015）。〈西方友誼研究及其在地用處初探〉，《臺灣社會研究季刊》，99：1-77。
- 何明修（2006）。〈臺灣工會運動中的男子氣概〉，《臺灣社會學刊》，36：65-108。
- 余貞誼（2016）。〈「我說妳是妳就是」：從 PTT「母豬教」的仇女行動談網路性霸凌的性別階層〉，《婦研縱橫》，105：22-29。
- 李美枝、鍾秋玉（1996）。〈性別與性別角色析論〉，《本土心理學研究》，6：260-299。
- 林東龍、劉蕙雯（2016）。〈照顧男子氣概與男性公務人員育嬰留職經驗〉，《女學學誌：婦女與性別研究》，39：59-109。
- 孫志硯（2008）。〈陽剛特質與媒體職場的性別化實踐：以報社攝影記者的工作為例〉，《中華傳播學刊》，13：75-115。
- 涂懿文、唐文慧（2016）。〈家庭關係與男子氣概的建構：一個漁村男性的遷移傳記〉，《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28(2)：215-258。
- 袁支翔、蕭蘋（2011）。〈展售男性氣概：男性生活時尚雜誌呈現的新男性形象分析（1997-2006年）〉，《新聞學研究》，107：207-243。
- 高穎超（2006）。《做兵、儀式、男人類：臺灣義務役男服役過程之陽剛氣質研究（2000-2006）》。臺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張榮顯、楊幸真（2010）。〈玩耍？霸凌？國小高年級男童性霸凌者經驗之探究〉，《教育學誌》，24：41-72。
- 畢恆達（2003）。〈男性性別意識之形成〉，《應用心理研究》，17：51-84。
- 畢恆達、黃海濤、洪文龍、潘柏翰（2017）。〈男性青少年群體同嗨（high）的打鬧遊戲：「阿魯巴」〉，《臺灣社會學》，34：1-43。

- 許華孚 (2008)。〈走入歧途的男性氣概：分析我國少年暴力犯的男性氣概〉。《犯罪學期刊》，11(1)：75-118。
- 郭怡伶 (2005)。《磨蹭的快感？—阿魯巴的男子氣概建構》。臺灣大學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
- 黃淑玲 (2003)。〈男子性與喝花酒文化：以 Bourdieu 的性別支配理論為分析架構〉，《臺灣社會學》，5：72-132。
- 黃淑玲 (2006 年 9 月)。〈階級、族群與男性氣概〉，「2006 臺灣女性學學會年會暨性別表徵&權力關係研討會」，臺北文山。
- 黃淑玲、白爾雅 (2018)。〈男子氣概的建構與新貌〉，黃淑玲、游美惠編《性別向度與臺灣社會》(第三版)，頁 273-296。臺北：巨流。
- 楊幸真 (2010)。〈成為男孩：陽剛特質的學習路〉，游美惠、楊幸真、楊巧玲編《性別教育》，頁 51-76。臺北：華都文化。
- 楊幸真 (2012)。〈高中男生陽剛特質學習與實踐之民族誌研究〉，張盈堃、吳嘉麗編《陽剛氣質：國外的論述與臺灣的經驗》，頁 67-108。臺北：巨流。
- 趙梅如、王世億 (2013)。〈大學生同性友誼品質之內涵驗證及性別差異分析〉，《教育心理學報》，44(4)：829-852。
- 劉家鈞、郭麗安、王沂釗 (2009)。〈男人的新天堂路：已婚男性與性別平等意識之互動〉，《應用心理研究》，43：207-251。
- 龔苡瑄譯 (2020)。《我是男生，也是女性主義者》。臺北：EZ 叢書館。(原書 崔乘範 [2018]. 《저는 남자고, 페미니스트입니다》。)
- Anderson, E. (2009). *Inclusive masculinity: The changing nature of masculinities*. London, UK: Routledge.
- Anderson, E., & McCormack, M. (2015). Cuddling and spooning: Heteromascularity and homosocial tactility among student-athletes. *Men and Masculinities*, 18(2), 214-230.
- Anderson, E., & McCormack, M. (2018). Inclusive masculinity theory: Overview, reflection and refinement. *Journal of Gender Studies*, 27(5), 547-561.
- Arxer, S. L. (2011). Hybrid masculine power: Reconceptualiz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omosociality and hegemonic masculinity. *Humanity & Society*, 35(4), 390-422.

- Bih, H. & Huang, H. (2012). Aluba and “high” culture: Adolescent male peer culture in play. *Gender and Education*, 24(2), 147-158.
- Bird, S. R. (1996). Welcome to the men’s club: Homosociality and the maintenance of hegemonic masculinity. *Gender & society*, 10(2), 120-132.
- Brannon, R. (1976). The male sex role: Our culture’s blueprint of manhood, and what it’s done for us lately. In D. S. David and R. Brannon (Eds.), *The forty-nine percent majority: The male sex role*, (pp. 14-15, 30-32).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 Bridges, T. (2014). A very “gay” straight? Hybrid masculinities, sexual aesthetics, and the chang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masculinity and homophobia. *Gender & Society*, 28(1), 58-82.
- Bridges, T., & Pascoe, C. J. (2014). Hybrid masculinities: New directions in the sociology of men and masculinities. *Sociology Compass*, 8(3), 246-258.
- Chu, J. Y. (2005). Adolescent boy’s friendships and peer group culture. *New Directions for Child and Adolescent Development*, 107, 7-22.
- Connell, R. W. (1995). *Masculinities*.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Connell, R. W. (2001). Understanding men: Gender sociology and the new international research on masculinities, *Social Thought & Research*, 24(1/2), 12-31.
- Connell, R. W. (2002). On hegemonic masculinity and violence: Response to Jefferson and Hall. *Theoretical Criminology*, 6(1), 89-99.
- Connell, R. W. (2003). Masculinities, change and conflict in global society: Thinking about the future of men’s studies. *Journal of Men’s Studies*, 11(3), 249-266.
- Connell, R. W. (2005). Globalization, imperialism, and masculinities. In M. S. Kimmel, J. Hearn, and R. W. Connell (Eds.), *Handbook of studies on men & masculinities* (pp. 71-89). Thousand Oaks, CA: Sage.
- Connell, R. W. and Messerschmidt, J. W. (2005). Hegemonic Masculinity: Rethinking the Concept. *Gender & Society*, 19(6), 829-859.
- de Boise, S. (2015). I’m not homophobic, “I’ve got gay friends”: Evaluating the validity of inclusive masculinity. *Men and Masculinities*, 18(3), 318-339.
- Demetriou, D. Z. (2001). Connell’s Concept of Hegemonic Masculinity: A Critique. *Theory and Society*, 30(3), 337-361.

- Flood, M. (2008). Men, sex, and homosociality: How bonds between men shape their sexual relations with women. *Men and masculinities*, 10(3), 339-359.
- Ghail, M. A. (1994). *The making of men: Masculinities, sexualities and schooling*. Buckingham, UK: McGraw-Hill Education.
- Hammarén, N., & Johansson, T. (2014). Homosociality: In between power and intimacy. *SAGE Open*, 4(1), 1-11.
- Haywood, C., Johansson, T., Hammarén, N., Herz, M., & Ottemo, A. (2017). *The conundrum of masculinity: Hegemony, homosociality, homophobia and heteronormativity*. London, UK: Routledge.
- Kessler, S. J., Ashenden, D. J., Connell, R. W., & Dowsett, G. W. (1982). *Ockers and disco-maniacs*. Sydney, Australia: Inner City Education Centre.
- Kindlon, D., & Thompson, M. (1999). *Raising cain: Protecting the emotional life of boys*. New York, NY: Ballantine.
- Louie, K. (2002). *Theorizing Chinese masculinity*.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accoby, E. E. (1990). Gender and relationship: A developmental account. *American Psychologist*, 45(4), 513-520.
- Magrath, R. & Scoats, R. (2019). Young Men's Friendships: Inclusive Masculinities in a Post-university Setting. *Journal of Gender Studies*, 28 (1), 45-56
- Messner, M. (1993). "Changing men" and feminist politic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ory and Society*, 22(5), 723-737
- Migliaccio, T. (2009). Men's friendships: Performances of masculinity. *The Journal of Men's Studies*, 17(3), 226-241.
- O'Neill, R. (2015). Whither critical masculinity studies? Notes on inclusive masculinity theory, postfeminism, and sexual politics. *Men and Masculinities*, 18(1), 100-120.
- Pascoe, C. J. (2005). "Dude, you're a fag": Adolescent masculinity and the fag discourse. *Sexualities*, 8(3), 329-346.
- Pfaffendorf, J. (2017). Sensitive cowboys: Privileged young men and the mobilization of hybrid masculinities in a therapeutic boarding school. *Gender & Society*, 31(2), 197-222.
- Randles, J. (2018). "Manning Up" to be a Good Father: Hybrid Fatherhood, Masculinity, and US Responsible Fatherhood Policy. *Gender & Society*, 32(4), 516-539.

- Robinson, S., Anderson, E., & White, A. (2018). The bromance: Undergraduate male friendships and the expansion of contemporary homosocial boundaries. *Sex Roles, 78*, 94-106.
- Robinson, S., White, A., & Anderson, E. (2017). Privileging the bromance: A critical appraisal of romantic and bromantic relationships. *Men and Masculinities, 22*(5), 859-871.
- Rumens, N. (2018). Age and changing masculinities in gay-straight male workplace friendships. *Journal of Gender Studies, 27*(3), 260-273.
- Stearns, P. N. (1990). *Be a man! Males in modern society*. New York, NY: Holmes and Meier.
- Swain, J. (2000). "The money's good, the fame's good, the girls are good": The role of playground football in the construction of young boys' masculinity in a junior school.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of Education, 21*, 95-109.
- Way, N. (2013). Boy's friendships during adolescence: Intimacy, desire, and loss. *Journal of Research on Adolescence, 23*(2), 201-213.
- Wood, J. T. & Inman, C. C. (1993). In a different mode: Masculine styles of communicating closeness. *Journal of Applie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1*, 279-295.
- Wood, J. T. (2015). *Gendered lives: Communication, gender, and culture*. Stamford, CT: Cengage Learning.

“Doing” Men: The Construction of Masculinities in Heterosexual Men’s Same-sex Friendships in Different Life Stages

Pei-Wen Lee*

Abstract

The current research adopts the relational interaction and “multi-masculinities”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attempting to explore the construction of masculinities in men’s same-sex friendships. A total of 17 college level educated and above, heterosexual, middle class adult males were interview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as participants grew across different life stage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ir masculinities turned from hegemonic style to a more inclusive and gender equal tendency due to their experiences of gender relationships and observations of gender inequality. Participants who are 30 years old and above tended to show more agency in challenging hegemonic masculinity; however, expressing mutual love to each other remained as a taboo among heterosexual males..

Keywords: inclusive masculinity, same-sex friendships, homosociality, men’s studies, multi-masculinities

* Pei-Wen Lee is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Department of Speech Communication, Shih Hsin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